

稳定日中关系的可能性

——从塘沽停战协定到卢沟桥事件

[日]户部良一

前言：“十五年战争论”

“十五年战争论”是理解 1930 年代日本对外行动问题上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历史解读。当初这一说法被理解为一种单线式的历史解释，即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再到太平洋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满洲事变使得日中无法避免一战，日中战争无法逃脱太平洋战争的命运。围绕这一历史解读，日本近现代史学家展开讨论，对十五年战争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比如臼井胜美曾经指出，从 1931 到 1937 年，日中两国之间并不是处于连续战争的状态，按照 1933 年的塘沽停战协定，满洲事变告一段落，之后在处理方式上，日本完全有可能避免日中全面战争。^① 在这种批评之下，主张十五年战争论的学者开始否定三场战争之间的必然连续性。江口圭一称，虽然从三场战争互相连续、互相关联这个意义和十五年跨度这个意义两个层面统称为十五年战争，但这种连续性完全是人为政策选择的结果，并不是某种长期方针或预定计划的实现。^② 安井三吉也认为从柳条湖事件到卢沟桥事件并不是一个向全面战争直接迈进的过程。^③

但是，十五年战争论的倡导者一方面否认三场战争之间的必然连续性，另一方面也不承认臼井所提出的塘沽停战协定后存在可以避免日中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江口圭一批评臼井只把正规军之间的战斗看做战争，而无视“满洲”、华北地区的反满抗日游击战。对此，小林英夫指出像抗日游击战和讨伐战这种军事行动，只不过是间歇性发生的短期局部战争的连续，并从这一点上对十五年战争论是否妥当提出质疑。^④

以上这些围绕十五年战争论的争吵，限于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爆发这一时期，可以总结为两个要点。一个就是从塘沽停战协定到卢沟桥事件期间，是否存在避免全面冲突或者日中关系稳定化的可能性；另外一个就是，是否可以把同一时期发生的间歇性军事行动看作是“战争”。

本文从这两个争论的焦点中选择围绕稳定日中关系可能性的论证为考察对象，介绍与日中战争前史相关的最新实证研究成果，希望以此揭示满洲事变以后究竟是否存在稳定日中关系的现实方法，以及如果有这样的方法却没能付诸实现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动向和前景。

① 参照臼井胜美，《中国をめぐる近代日本の外交》，筑摩书房 1983 年版。

② 参照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青木书店 1986 年版；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研究史論》，校仓书房 2001 年版。

③ 安井三吉，《柳条湖事件から盧溝橋事件へ——1930 年代華北をめぐる日中の対抗》，研文社 2003 年版。

④ 小林英夫，《日中戦争——殲滅戦から局地戦へ》，讲谈社 2007 年版。

一 塘沽停战协定

塘沽停战协定是日中两国军事当局 1933 年 5 月末签署的协定。根据这份协定,入侵关内的关东军撤回长城线以北,而南边则设定为广阔的非武装地带。据鹿锡俊研究,蒋介石考虑的是与其继续抵抗丢掉更多土地,还不如暂时屈服寻求妥协以期将来收复失地。^①

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代表“满洲国”的关东军和中国的华北当局之间开始了有关两地之间联络方面的实际业务的交涉。双方在 1934 年 6 月通车、12 月通邮实现之后,马上就设关达成一致。

批判十五年战争论的历史学家从以上事实认为满洲事变通过塘沽停战协定暂且画上了一个句号。因为协定签订后日军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作战行动。稳定日中关系的基础,也通过双方的务实性妥协建立起来。

但是,若站在十五年战争论的立场上,塘沽停战协定并不是满洲事变的结束,而是华北分离工作的开始。古屋哲夫认为,通过这份协定日军实现了在日本统治区域外建立傀儡政权的统治区,并以此作为新的侵略据点的侵略形式。并且那时,问题的处理不是交给政府之间进行外交交涉,而是采用由当地军队领导的地方处理形式——“就地解决方式”。^②

不过也不应忽略掉,就地解决、地方处理都得到了中国政府自身的许可这一侧面。因为如果是政府之间进行官方交涉,容易生出不得不承认“满洲国”存在的局面。在实务交涉过程中,中方虽然同意制订与关东军之间的协议备忘录,但拒绝签字,也不愿意由国民政府成为协议的当事人。^③

而当实务问题达成妥协以后,日本的陆军中央、关东军也没有计划新的军事侵略,可以说偏向于维持现状。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以“满洲国”的存在作为既成事实,把华北的当地交涉当作军事相关问题委托给驻屯军,开始着手修复和稳定与整个中国的关系。^④

华北的军事紧张局面虽然得到缓和,但事态依然不稳。实务交涉的成果是否能稳定日中关系,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此后日本政府的动向。

二 广田外交

华北的军事紧张稍获缓和之时,日本广田弘毅就任外相(1933 年 9 月),直到 1937 年 2 月,其中也包括了担任首相的时代,广田弘毅领导了日本的外交。在对华政策方面,外务次官重光葵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广田与重光希望通过与中国政府内部的亲日势力合作来稳定日中关系。酒井哲哉认为,广田和重光对蒋介石政权的对日绥靖性充满期待,支持由蒋介石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同时希望通过帮助中国从欧美等列强手中收回权益来获得中国的对日合作。^⑤

1934 年 4 月发布的天羽声明体现了广田、重光的这种构想。这份声明虽然表示反对欧美各国政治干预东亚及对华提供援助,但按照井上寿一的看法,其目的在于反对中国政府的欧美派(宋子

① 鹿锡俊:《中国国民政府の対日政策 1931—1933》,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1 年版。关于塘沽停战协定,还参照了内天尚孝著:《华北事变の研究—塘沽停戦協定と華北危機下の日中関係 1931—35 年》,汲古书院 2006 年版。

② 古屋哲夫:《日中戦争にいたる対中国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古屋哲夫編《日中戦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 1984 年版;古屋哲夫:《日中戦争》,岩波书店 1985 年版。

③ 光田刚:《華北「地方外交」に関する考察》,《近代中国研究集報》第 22 号,2000 年。

④ 白井胜美:《日中外交史研究》,吉川弘文馆 1998 年版。

⑤ 以下酒井论述内容参照酒井哲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体制の崩壊》,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2 年版。

文等)为抵抗日本而预备发展与欧美各国关系的获得经济援助的计划,同时扶植追求稳定与日本关系的“亲日派”(蒋介石、汪精卫等)。^①

1934年1月,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11月攻陷瑞金中共政权,加强了权力基础。1935年1月蒋介石以徐道邻之名发表论文,呼吁中日亲善。广田外相像是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进行回应,在帝国议会上也提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口号。同年2月,中国政府下令禁止全国所有报社刊登排日言论,3月命令各省市教育部禁止使用反日教科书。

同年5月,日中两国交换大使。日本为了表示与中国外交的平等关系,在各主要列强中采取了主动,以先发制人。同年6月中国政府公布邦交敦睦令,禁止排日运动。在这种亲善风潮下,两国经济界的交流也开始活跃起来。

有了这些积累,两国政府欲就日中外交达成一致。中方提出了尊重相互独立与相互平等、友好交流、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三项原则。日方对此反应较迟,1935年10月才决定了广田三原则作为政府方针:1. 中国彻底取缔排日运动,抛弃依靠欧美政策;2. 默认“满洲国”独立(尽可能正式承认);3. 共同合作,排除赤化势力威胁(防共)。

广田三原则彻头彻尾反映了日本单方面的要求。因为它考虑的不是对方国家的权利和责任,而是更多地考虑协调国内相关人士的主张和要求。这一时期日本驻华军队在华北的“北支”工作正积极进行,广田和重光就算是为了抑制这一行为也必须采用一部分陆军的主张。

与中国对此是否能接受的考虑相比,更加重视国内妥协而出炉的广田三原则想要获得中国的认可非常困难。应该说,广田三原则没能成为稳定日中关系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广田、重光错过了稳定日中关系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还有一次,就是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当时中国实质上采取的是银本位制度。世界银价的飙升使白银大量流向海外,中国因此遭受巨大的打击,希望依靠外债进行币制改革。应此要求,英国向日本提出希望日英提供共同借款帮助中国。但是,日本政府否定了这一提议。结果中国政府接受英国的帮助于1935年11月断然实行币制改革,在经济上推进了国家统一大业。

为何广田、重光对英国的提议态度消极。波多野澄雄解释说广田和重光希望排除欧美各国对东亚问题的干预,害怕英国的政治影响力通过借款继续维持及得到强化。^②

井上寿一指出这一消极态度有以下两点理由:第一,因扩大对满投资而没有余力;第二,国民政府内部的“亲日派”倡导自力更生,对借款态度消极,而将稳定对华关系押在与国民政府内部“亲日派”合作上的广田、重光,不能不重视“亲日派”的主张。

如果日本答应了英国的提议,实现了日英合作,或许对日中关系的稳定会取得正面的效果,但日本放掉了这一机会。

三 “北支”工作

虽然广田、重光承认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但当地的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对此持否定态度。当地日本驻军认为未放弃收复失地的国民政府本质上还是“抗日”,所以从“满洲国”的防卫及对苏战争

^① 以下井上论述内容参照井上寿一:《危機のなかの協調外交——日中戦争に至る対外政策の形成と展開》,山川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波多野澄雄:《幣制改革への動きと日本の対中政策》,野泽丰编《中国の幣制改革と国際関係》,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

出发,努力阻止国民政府把控制范围扩展至华北。当地日本驻军认为国民政府改善对日关系的姿态不过是一种做戏,对交换大使这一做法也进行了批评。^①

交换大使以后,1935年5月末,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要求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对抗日反满武装集团侵入“满洲国”和反日恐怖事件负责,提出国民党机关须从河北撤退、罢免省主席、中央军移驻到河北省外等要求。

酒井的行动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不在期间的独断专行^②,梅津还有陆军中央接到要求通告的事后报告时,曾有过短暂的困惑不解,不过之后也对酒井提出的要求表示认可。中方向日本政府申请斡旋解决,但广田外相以地方的军事问题不属外交交涉范畴为由没有插手。6月中旬,何应钦接受了酒井的协定(《梅津·何应钦协定》)。

同一时期,在察哈尔省的张北,关东军以日本陆军的特务机关人员被监禁事件为借口,派土肥原贤二向省代理主席秦德纯提出要求,内容包括第二十九军撤到长城以南、解散排日机关等。6月下旬,秦德纯批准该项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

日本政府试图与中国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努力,由于驻扎华北的日军的策动不得不中断。中国的币制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日本驻华军队担心国民政府对华北的经济控制得到强化,积极开展“北支”工作进行反击。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向华北中国将领施压妨碍币制改革,积极开展华北“自治”运动。

结果“自治”运动实现的成果只有一个,即11月下旬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下旬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政治错综复杂,包括了日本所策划的分离华北、蒋介石所推动的统一华北和华北中央化以及被统治对象华北将领们的军阀心理。^③妥协的结果就是12月中旬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由于日军的“北支”工作,“亲日派”在国民政府的影响力下降。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不久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12月作为外交部次长全权负责对日外交的唐有壬被暗杀。希望通过与国民政府内部的亲日派合作达到稳定对华关系的广田、重光外交失去了达成目标的前提条件。

为何日本政府、陆军中央没有制止驻华军队的“北支”工作?对这一问题,井上寿一的解释比较具有说服力。他认为陆军在塘沽停战协定中达到了眼前的目标,所以以永田铁山(陆军省军务局长)为中心的陆军中央把培养伪满洲国以应付将来的对苏战争作为最先考虑的问题,对外希望维持现状。外务省为了稳定对华关系而开展的政策就是在这种与陆军中央相提携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对维持现状政策心怀不满的驻华日军,独断专行积极进行“北支”工作。陆军中央一方面事后承认了《梅津·何应钦协定》和《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同时也因此中止“北支”工作,欲压制当地日军。然而1935年8月永田因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突然遭到暗杀,外务省失去了陆军内部强有力的合作伙伴。永田死后,陆军中央失去了实质上的领导,丧失了统治驻华日军的意志和能力。^④就这样,陆军的“北支”工作从1935年秋以后全面展开。

一直以来,“北支”工作与外务省之间的关系被看作是外务省为推动广田三原则,利用“北支”工作作为对华交涉的压力,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是步调一致,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井上寿一、酒井哲哉

① 户部良一:《陸軍「支那通」と中国国民党》,《防衛大学校紀要》第68号,1994年3月;户部良一:《日本陸軍と中国——「支那通」にみる夢と蹉跎》,讲谈社1999年版。

② 松崎昭一:《再考「梅津·何应钦协定」》,军事史学会编《日中戦争の諸相》,锦正社1997年版。

③ 关于华北政治参照光田刚:《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 1928—1937年》,お茶の水书房2007年版。

④ 关于这一点,森靖夫的《日本陸軍と日中戦争への道——軍事統制システムをめぐる攻防》(ミネルヴァ书房2010年版)一书,从“军政”占优势地位的陆军统治体系的崩溃这一视角作了考察。

等近些年的研究则强调了两者对立的一面。就是说为了防止“北支”工作扩大化,必须取得一些与国民政府交涉的具体成果让陆军信服,所以外务省必须以执拗且强硬的态度进行广田三原则的交涉,主张不是利用“北支”工作作为交涉过程中的施压砝码,反而是为了制止“北支”工作才不得不强硬交涉。

不管怎么样,失去了陆军中央的统制,驻华日军的“北支”工作就没有了束缚,中国政府的“亲日派”因此衰落。广田外交就这样走到尽头。

四 对华政策的再探讨

“北支”工作强行实施以后,日中关系恶化,事态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以冀东特殊贸易为名的走私交易在华北甚为猖獗^①,给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带来巨大打击的同时也使国内经济陷入混乱。中方虽然对此表示抗议,但日本以此为中国内政问题为由不予理睬。

进入1936年陆军中央才出现对“北支”工作过火行为的反省动向,与外务省再次走到一起开始重建对华外交。这是井上寿一论述的内容。作为重建对华外交的具体措施,井上注意到须磨弥吉郎(南京总领事)提出的“北支五省特政会”构想。这一构想与华北分离工作对抗,承认国民政府对华北行使主权。特政会案得到陆军中央的支持,被寄予希望能够成为对华新政策的一张王牌。不过,该案没能引起中方的积极反应。

1936年5月,日本陆军将中国驻屯军兵力增强了3倍(约5800人)。其目的在于使急于强行推动“北支”工作的关东军从华北收手,专心建设“满洲国”。^②从这一点来讲,也可以说是陆军中央政策转换的一环。但是,制止关东军的目的不能对外宣布。因此,增强中国驻屯军的举动进一步加深了中方对日本准备侵略的怀疑,激发了中方的抗日意识,完全违背了日本陆军中央的初衷。

那时频频发生一些显示日中形势险恶的事件。1935年11月在上海、1936年8月在成都、9月在广西省北海都有日本人被杀害。围绕这些事件的善后措施进行外交交涉的时候,发生了绥远事件,获得关东军支持的德王(伪内蒙军首领)侵入绥远省北部,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后溃败。中日交涉随之触礁搁置。中国军队在绥远事件中的胜利被大肆报道,抗日情绪高涨。

之后不久的12月中旬,西安事变爆发。在当时的日本,围绕这一事件的意义产生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解释。一种是将其看作中国内部严重分裂的意见;另一种认为这是中国走向国内统一的重要转机。舆论界宣传要重新认识中国,对国民政府进行国家统一进行了肯定性评价,实业界中也出现了一部分批评“北支”工作,主张日中经济提携的意见。^③

就这样,日本开始了对华政策的重新探讨。首倡者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石原认为,为了将来的对苏战争,眼下应该专注建设“满洲国”,希望避免与中国的冲突。因此,他反对内蒙工作^④,否定分离华北,同时也一直在考虑解散冀东政权。外务省也于1937年3月在佐藤尚武外相(林銑十郎内阁)主持下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政府内部(包括陆海军在内)新统一的方针重点在于停止分离华北工作、实行日中经济提携。^⑤

① 藤枝贤治:《冀東貿易をめぐる政策と对中国関税引下げ要求》,军事史学会编《日中戦争再論》,锦正社2008年版。

② 松崎昭一:《支那駐屯軍増強問題》,《國學院雜誌》第96卷第2、3号,1995年2月、3月。

③ 伊香俊哉:《日中戦争前夜の中国論と佐藤外交》,《日本史研究》第345号,1991年5月。

④ 关于内蒙工作参照森九男:《関東軍の内蒙工作与蒙疆政権の成立》,《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1 植民地帝国日本》,岩波书店1992年版;照森九男:《日本陸軍と内蒙工作……関東軍はなぜ独走したか》,讲谈社2009年版。

⑤ 藤枝贤治:《「佐藤外交」の特質》,《駒澤大学史学論集》第34号,2004年4月。

不过,政策转换取得成绩需要时间。就在成效显著之前,1937年6月林内阁总辞职,佐藤也离开外相职位。卢沟桥事件就在这之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了。

结 语

臼井胜美在批评“十五年战争论”之后,曾经指出存在稳定日中关系的可能性,同时也认为日本没有充分追求这种可能性。井上寿一和酒井哲哉从臼井对十五年战争论的批判中受到刺激,探索稳定日中关系的机会及丧失机会的原因。井上与酒井一方面指出广田、重光判断和选择的错误,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广田和重光并没有简单地对陆军采取妥协、追随态度,应该说他们在受到陆军强硬行动束缚的情况下还在追求稳定对华关系。可以说,在稳定日中关系的可能性问题上,对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争论的基础上又生出另外一个争论,即日本有没有充分追求这一可能性。

如果存在稳定日中关系的可能性,非常明显阻碍这种可能性实现的是驻华日军的“北支”工作。因为广田和重光所追求的日中关系的稳定化是以拥有满洲国、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作为前提条件,而驻华日军的“北支”工作却是要把国民政府的势力从华北排除出去。

关于日中关系稳定化,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如果日本去认真摸索这种可能性,中国是否可能回应。广田三原则、“北支特政会”都没有得到中方的认同。除此以外还有过其他具体方案吗?当时日本(广田、重光)所描绘的日中关系的稳定化,是否能够为中国所接受?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

最后,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接受的可能性必须要重视的是蒋介石的对日战略。今井骏认为蒋介石的剿共战中包含着准备对日持久战的想法,“安内攘外”政策中含有抗日的元素。^①岩谷将认为从《梅津·何应钦协定》中央军被迫撤出河北省开始,蒋介石就开始向抗日严重倾斜,国防建设的进展与剿共事业的成功使其对日妥协战略转换为抵抗战略。^②实际上,蒋介石曾经摸索对苏、对德合作政策就可以证明这一点。^③面对日本强硬的“北支”工作,蒋介石曾向苏联打听一旦与日本开战是否能获得军事援助。的确,蒋介石还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解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分离华北的活动进一步增强,也必须做好与日本发生武力冲突的准备。

近些年来关于日中战争前史的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卓越的进展。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等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如果能够阐明中国对日态度和对日战略,必定对日中关系稳定化的可能性研究作出巨大的贡献。

(作者户部良一,日本防卫大学教授;译者高莹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今井骏:《中国革命と対日抗戦——抗日民族統一戦線史研究序説》,汲古書院1997年版。

② 岩谷将:《1930年代半ばにおける中国の国内情勢判断と対日戦略——蒋介石の認識を中心として》,《戦史研究年報》第13号,2010年3月。

③ 鹿錫俊:《日ソ相互牽制戦略の変容と蒋介石の・応戦・決定》,軍事史学会編《日中戦争の諸相》,锦正社1997年版;樹中毅:《蒋介石の民族革命戦術と対日抵抗戦略》,《國際政治》第152号,2008年3月。